

# 算盘里的旧时光

□陆萍萍文摄

在书柜的左上角，立着一架瘦长的旧算盘。每次起身抽书，目光总忍不住在它身上停留片刻。

今天，我伸手将它取下。摩挲着那层泛着岁月光泽的深褐色木框，指腹抚过一颗颗被时光打磨得油润泛黄的白珠子。指尖轻拨，算珠碰撞发出零星而脆亮的声响，恰如春雨滴落在青瓦窗台，叮叮咚咚。这清脆的回响，瞬间勾起我对婆婆无尽的思念。

犹记新婚那年春节，我到婆婆家拜年。老人家递给我一本“煤气簿”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：“这白市煤气的户主是阿凯（先生小名），你拿着。今天回去，把煤气瓶也带回去。”我当时有些发懵，不知所措，只得默默接过。20世纪80年代，有户煤气与黑户煤气待遇天差地别，充气点也不一样。那本薄薄的煤气簿，实实在在为我们小两口的生活，撑起了一份踏实的保障。

在我与婆婆相处的30多年里，她的人生，恰似这架工整的算盘——对生活的每一笔都拨弄得分毫不差，唯独对自己，永远归置于零档。

平日里，她是最不肯接受好意的老人。我出差回来，送她一套新衣服，她嘴上总带着嗔怪：“乱花钱，我不要。”那责备的语气里，藏着的是怕给儿女添负担的心思。若是送些新鲜蔬菜，她要么说牙口不好咬不动，要么嫌分量太多吃不完；有几次丈夫独自送去，她性子上来，竟硬生生把东西推了回来，固执得像不肯妥协的孩子。在吃穿用度上，她一辈子都在拒绝被照顾，仿佛多花一分钱、多享一点福，都是一种浪费。

可一旦事关家人，她瞬间就从那个节俭的老太太，变成了家里最公道、最有担当的主心骨。当年小弟买药手头拮据，她召集三个儿子、三个媳妇到家，一字一句、条理分明地商定方案，不偏不倚、公平合理，坚持让所有人都签字认可。那一刻，她身上没有半分小家子气，只有大家长的沉稳与公正，把一大家子的和睦，算得明明白白。

她做了一辈子会计，严谨细致早已刻进骨血，一笔一划，算尽家中的安稳。她用勤俭的烟火，点亮三餐四季，硬是把艰难的岁月，过出了条理分明的模样。

常听丈夫说起，他17岁那年，公公突然离世，原本温馨幸福的家，顷刻间天塌地陷。

婆婆强咽泪水、忍下悲痛，用瘦

弱的肩膀，挑起一地琐碎的生活，在风雨中，成了独自撑起屋檐的那个人。在饮食店做会计的日子里，她上午和店员们一起揉面、做馒头、包馄饨；午餐时分，就用热水冲泡自带的冷饭，就着腐乳，草草果腹。午后，便坐在工作台旁，左手拇指与食指捻动算珠，动作沉稳利落，归位时清脆磕碰，一上一下，噼啪作响。右手紧握着笔，将一串串账目记得准确无误。伴随着蒸笼里此起彼伏的汽鸣声和大锅里的煎炸声，笔尖在账簿上沙沙游走，那是专属于她的生活节奏，清晰且坚定。算盘像个神奇的匣子，把每天的面粉、馄饨、包子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下班后，她再把中午从自己口中省下的馄饨或肉包装进空饭盒，带回家给正在长身体的三个孩子吃。

婆婆打了一辈子算盘，处处精打细算，却从无半分斤斤计较的刻薄，只有细水长流的温厚。她把算盘打得锃亮，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，把公道算得明明白白，把一家人的日子算得和和睦睦，却唯独从未盘算过自己。

直到自觉身体渐渐不支，她悄悄把我拉到床边，颤巍巍地捧出一个普通的饼干盒。打开的刹那，酸涩瞬间涌上眼眶。里面是一卷卷码得整整齐齐的钱款，每一卷外面，都细心裹着一张小纸条。秀气的钢笔字行行分明：谁给的钱、何时给的、具体金额多少，孩子上学、结婚的开销逐一扣除，结余多少，记得一丝不苟、清清楚楚。

她用算盘算清了每一分钱，却从不算计人情；记清了每一笔人情往来，记录着每一分家用开销，把家人的难处、孩子的未来，都仔仔细细写在纸上，刻在心里。

如今，婆婆离去已10年，这架算盘依旧静静立在我的书柜里。白算珠虽已泛黄，却依旧能拨出清脆的声响。指尖划过算珠，仿佛又触到婆婆的温度，触到那些被算盘丈量过的、满是烟火气的旧时光。

真正的勤俭，从不是对生活的苛责，而是把每一份暖意都精准投放给家人；最好的持家，也不是烦琐的算计，而是用一颗温热而笃定的心，将散落的日子一一缝补得妥帖温暖。

这架旧算盘，是婆婆留给我最珍贵的念想。它静卧在时光深处，拨响着岁月的余音，仿佛在时刻提醒我：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要装着这样一架算盘，算清生活的本真，守住家的温情。



## 一只军用水壶

□凌金位 文/摄



这只军用水壶已有57年历史，算得上是我家的“文物”。事情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。某年初夏，村里来了一个营的解放军战士，与当地百姓共叙军民鱼水情。战士们被挨家挨户安排在村民家中居住，白天或是野营训练，或是帮农民干农活，晚上就宿在村民家里。我们家也住了3位解放军战士。半个多月后，部队启程离开村庄，临走时，一只军用水壶落在了他们住过的房间里。不知是有意相赠，还是不慎遗忘。

那年7月中旬，“双抢”如期而至，这只军用水壶终于派上了用场。年仅15岁的大姐跟着父亲去生产队割稻子、挣工分。每天天还未亮，大姐就从睡梦中被叫醒，母亲把水壶灌满茶水，大姐背着它，顶着满天星斗，跟着大人们下地割稻。弯腰割稻体力消耗极大，一壶茶不出一个时辰就喝得一千二净。没水了怎么办？便去稻田周边的山泉、井边、溪坑里重新灌水。

虽说是“水壶”，有时也用来装酒。父亲平日里劳作辛苦，晚上常会喝一点酒解乏。那时，父亲会给二姐几角零钱，让她去村里的小店打一斤或半斤“枪毙烧”。酒打回来后，父亲就提着水壶，叮叮咚咚往碗里斟酒，就着小菜下酒。喝到微醺便适可而止，满脸通红地去村里的祠堂，上报当天的农活与工分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家乡

实行了包产到户。自家经营田地，干活更麻利，效率也更高，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“早上起五更，晚上睡三更，两头见星星”。乡亲们都说党的政策好，彻底结束了过去“磨洋工”的日子。即便包产到户，那只水壶依旧陪伴着姐姐们，只要外出劳作，她们就会把它灌满茶水。1987年秋天，我离开家乡，这只水壶也渐渐淡出了我的视线。它被长期放在谷柜上，那条结实的军绿色背带被老鼠咬断，壶塞也不知去向。

如今，家乡依旧有大片良田，只是早已没有了过去那种意义上的“双抢”。不少农民依旧种田，一来为自家提供口粮，二来也为在城里工作的子女种上一份绿色放心的粮食。每年春天，插秧机在水田里有条不紊地插秧，那段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成稻，后退原来是向前”的人工插秧岁月已成过往。稻穗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茁壮成长，到了收获时节，收割机便开进田间。稻田的主人只需坐在田头树荫下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用保温杯喝着茶水。

如今，这只军用水壶又悄悄回到了我身边。我把它郑重摆放在酒柜里，来客见了，无不好奇地端详一番。有时我也不免感慨，特意将几百元一瓶的好酒倒进这只旧水壶里，为亲友斟酒。几杯下肚，视线渐渐朦胧，那些“双抢”往事，便如烟雨朦胧的黑白电影一般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